

# 古代文体谱系论

□ 胡大雷

广西师范大学 中文系 广西 桂林 541004

谱系,即历代系统。经、子、史在先秦时已建立起自己的学统、谱系。“经”在《庄子》中就有所谓“六经”之称,《礼记·经解》具体记载六经在“为人”之“教”：“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。疏通知远,《书》教也。广博易良,《乐》教也。絮静精微,《易》教也。恭俭庄敬,《礼》教也。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。”诸子的谱系虽不分明,尚有迹可循,如儒家孔子之后的孟子、荀卿之列,墨家后学分离为三派,等等。史学从“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”,到言事一体的《左传》,再到司马迁继《春秋》而作《史记》,等等。而集部文字的谱系则建立较晚,其建立之初,就以述文体为纲,故又称为文体谱系。

文体建立独立的谱系,首先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诗赋”单独立类所产生的影响,其标志即以文体名来命名文本类别。《诗赋略》的建立是从经学谱系“六艺”中分化出来,赋分为四,其首列分别是屈原赋、陆贾赋、孙卿赋、杂赋,前三者即为赋的派别的创始人,突出的是以人为系。文体建立独立的谱系,刘熙《释名》亦功不可没,他把文体与其他事物分化开来叙说,其释文体名者有三:“释言语”类,有诸如“言,宣也,宣彼此之意也;语,叙也,叙己所欲说也;说,述也,序述之也”等对文体的叙说。“释书契”者,释与“书”“契”这两种动作有关的事物、概念,所论及文体者如“笔,述也,述事而书之也”,“简,间也,编之篇篇有间也;簿,言可以簿疏密也”等。“释典艺”中,有诸如“经,径也,如径路无所不通,可常用也;仪,宜也,得事宜也;传,传也,以传示后人;记,纪也,纪识之也”等,是有典范意义的文体。实际上,他把文体分为“口出”(言语)、“笔书”(书契)两大系统,又列出具有典范意义者(典艺)统领此二者,其对文体谱系的影响是大类区分以及文体名的阐释。文体建立独立的谱系,最重要的是总集的出现,挚虞《文章流别》为总集之祖,其“自诗赋下,各为条贯,合而编之”,即说在总集中诸文体的排列是平行的、各自单列的,现存最早的总集《文选》很好

地继承了如此体系。《文章流别》在文体排列下又有文体论说,并系挂作品及作家作品论;且其文体论说又是分层级的,如诗,“古诗率以四言为体”,“后世演之,遂以为体”,即三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九言都是“四言为体”衍生而来。

文章建立起以文体为核心的谱系,最为关键之处在于文章以篇为单位而独立,显示是独立的文体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“诗赋”单独立类走出第一步,任昉《文章缘起》明确称不论“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”,其所探讨的是“自秦汉以来,圣君贤士沿著为文之始。故因暇录之,凡八十四题”;他要建立自秦汉开始的、独立文体的文体谱系,即吴承学说:“任昉所要讨论的,是脱离经学束缚的个体文章创作。”萧统编《文选》,把集合化的经、史、子的文字排除出文体谱系,他有专门论证,于是总集只录单篇形成惯例。文体谱系另一核心问题是分层级,定源流、述传承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有诸多作家赋,都是从“屈原赋、陆贾赋、孙卿赋”衍生而来;《释名》所述诸多文体,都是“言语”“书契”“典艺”三大系统下的从属;《文章流别》“四言为体”下的三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九言;《文选》所谓“类分之中,各以时代相次”的作品排列,都有突出“为文之始”,又阐述为文之流。上述两个核心问题,都离不开系挂作家作品、论述作家作品,可见总集对于文体谱系的重要意义。

文体谱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文体的描述。刘熙“释言语”、“释书契”、“释典艺”,是通过“释名”来描述文体的性质与功能;挚虞《文章流别》专门有“论”来进行这项工作;李充《翰林论》所辨文体有诗、赞、表、驳、论、奏、盟、檄等,在文体辨析的同时还注意某人某文的特点;任昉叙说文体的缘始;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则以“原始以表末,释名以章义,选文以定篇,敷理以举统”为宗旨。通过文体描述,确定文体的身份,才确定其进入文体谱系的合理性,先唐的文体谱系早已确定这一工作。

唐代以后的文体学家对新生文体也要做这样的

工作。如“记”，为唐代盛行撰写嵌在墙上的碑记即“壁记”的扩伸，《文苑英华》《唐文粹》《宋文鉴》等都有记体，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·记》云：“大抵记者，盖所以备忘”；“叙事之后，略作议论以结之，此为正体”，把其一事一记一议的篇翰性质说得清清楚楚。又如“传”，吴讷《文章辨体序说·传》称：“厥后世之学士大夫，或值忠孝才德之事，虑其湮没弗白；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戒者，因为立传，以垂于世。”阐述其与《史记》列传的不同。“记”与“传”都本是史学文体，吴讷可以对其进行描述，世人即知其与正史所载不同，即知其进入文体谱系的合理性。

文体谱系的主要功能之二，揭示谱系内文体的因果关系。其一，文体谱系通过排列型描述，表达出诸文体的逻辑秩序及身份定位，通过级次的划分来解释文体产生的因果关系。如《文章流别》述“文章”，称文体都在其范围之内，其下有诗、颂、铭、诔、祝、箴、七、碑、诔、哀辞、哀策、图讖等文体，这是一个级次的；而诗“四言为体”下又分三、五、六、七、九言诗的论述，则是低一级次的文体类目。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，其篇名所属文体为一层级，以下又有一级次，如诗的四言、五言、七言、三六杂言等；“杂文”统领下的“对问”“七体”“连珠”，以及“汉来杂文，名号多品：或典诰誓问，或览略篇章，或曲操弄引，或吟讽谣咏。总括其名，并归杂文之区”。文体的等级差别，表现在排列顺序上，也表现在如此论述上。

后代在《文章流别》四言外其他诗体“非音之正”的影响下，往往强调以“正变”分文体的“高下”级次，如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不录“变体”；如《文章辨体》、《文体明辨》退“变体”为附编、外编，明代人彭时称《文章辨体》“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，一览可以具见”。

级次的划分或为文体下又以事类为目，萧统《文选序》称“凡次文之体，各以汇聚。诗赋体既不一，又以类分”，后世文章总集多如此以文体为纲、以事类为目两级次的编纂方式，至宋代时还占据主流。甚或文体下的以事类为目，也有级次，如黄宗羲《汪扶晨诗序》论诗的类型两级次，先以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区分类型，而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下又各有类型。

其二，文体谱系还有对文体崇尚的因果关系的解释，如对“文宗于经”、“（文）原出于五经”的辨析与解释。《文心雕龙》以“道、圣、经、纬、骚”为“文之枢纽”，认定“文”与“六经”分署两个谱系。但《文心雕龙》又称文应该“宗经”，“经”对各类文体来说，有“《易》统其首”者，有“《书》发其源”者，有“《诗》立其本”者，有“《礼》总其端”者，有“《春秋》为根”者；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也称文章“原出《五经》”，强调“文章”为社会、为朝廷的实用性，四库馆臣称，这是“特为明理致用而言”。

其三，文体谱系又有对各文体内在因素及文体间因果关系的分析。《文章流别》解释赋的古今不同，称“古诗之赋，以情义为主，以事类为佐”，故“言省而文有例矣”；而“今之赋，以事形为本，以义正为助”，于是“言富而辞无常”。又如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以“情以物兴，故义必明雅；物以情观，故词必巧丽”来解释赋的文采的产生；称“讹体”“谬体”的原因，或在于“褒过而谬体”，或在于“弄文而失质”，以及解释曹子建、陆士衡乐府作品“俗称乖调”，是因为“无诏伶人，故事谢丝管”。以上这些解释，都是既叙说了现象，又给出原因。

建立文体谱系的重要方法是“归类”，文体谱系既以单个文体为基本单位，又以“类”为基本单位，“归类”使文体谱系区化为数个或十数个相互并列的体系。刘熙《释名》就把文体归类为“言语”、“书契”、“典艺”三大集合体；唐代柳宗元《杨评事文集后序》称“文有二道，辞令褒贬，本乎著述者也；导扬讽谕，本乎比兴者也”，这是从文体起始来归类。不同的归类方式，文体谱系的意味也就不同；而文体谱系不同的意味，最终导致文体谱系发生变革。

文体“归类”或在于突出文体的体裁因素，如南北朝时期的“诗笔”之辨，有所谓“沈诗任笔”，有“谢玄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笔”，等等。在此基础上，“笔”又归为两类：“今文”“今体”与其对立的散体古文。于是，文体归类为诗、散、骈三大类，清王棻说：“文章之体三：散文也，骈文也，有韵文也。”这种突出文体的体裁因素的归类方式，促使诗、散、骈分录的总集或以某一归类为独立单位的总集的出现。如录诗的《玉台新咏》、《河岳英灵集》等；宋人姚铉《唐文粹》则为“古体”总集，宋代还有特别标榜以散体为主的“古文”的总集，如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、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等。明人贺复征《文章辨体汇选》，虽录132类文体，但不收诗赋。清代又有特别标榜专录“骈文”的总集，如陈维崧《四六金针》、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等。于是，文体谱系的身份，则分为诗或韵文的文体谱系、散文或古文的文体谱系、有骈或四六的文体谱系等。还有另一种文体归类，如南北朝时又有所谓“文笔之辨”，刘勰称为“无韵者笔也，有韵者文也”，或为范晔所云“公家之言”与私人化“事外远致”之别，或为萧绎《金楼子·立言》的“文笔”区分，称“吟咏风谣，流连哀思者，谓之文”，称“至如文者，维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适会，情灵摇荡”。这是“放弃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，开始以制作的技巧，重为文笔定标准”，这种归类方式的特性在于突出文体的功能因素。

“归类”开创了文体谱系新局面，即“经、子、史”的入集。宋代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以“归类”进行总集编纂，他以功能把文体归类为辞令、议论、叙事、诗

歌的四大类,也就是说,无论是否集部的文字,只要具有“辞命、议论、叙事、诗歌”功能的文字可以进入总集,这不能不说文体谱系的一大革命性行为,其表现即《文章正宗》录入史部的文字。“辞命、议论”所录的史部文字,应该都是“成文”,即原就是独立的、已经写成的文章,本是作为档案材料被史官保存着的。而“叙事”者,是经过真德秀选摘、拼凑而成的,如所录《史记》的《屈原传》,其就删略了《史记》所录屈原的《怀沙之赋》以及篇末的“太史公曰”等,使史书的“传”更像文章的“传”。尤为显著者,是真德秀破《左传》以“年”为单位的记事而以“叙事”为单位,如篇题为“叙某某本末”的第一篇《叙隐桓嫡庶本末》,或“叙某某”如《叙晋文始霸》。这些“叙事”,或为一年之中多种事的某一选录,或为一事跨两年度的合一。又如破《史记》以“人”为单位的“记事”,节录为以“事”为单位者,如篇题为“叙某某”的《叙项羽救钜鹿》、《叙刘项会鸿门》等。四库馆臣称:“总集之选录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,自是编始,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。”

于是,文体谱系不再仅仅是对存世文体的归纳与整理,而且可以在理性指导下寻求哪些文字以何种方式进入文体谱系。《文章正宗》的作法,引发一连串影响。又有“子”的文字进入总集,《文选》本有曹丕《典论》之《论文》入总集,这是以子书以“篇”的身份入总集的例子。到宋时,曾为真德秀宾客的汤汉《妙绝古今》,其录诸子之文,从《孙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淮南子》选摘文章,以“妙绝”为标准选摘一个个片段;以“妙绝”为文体的某一“归类”。又有“经”的文字进入总集。明孙鑛(号月峰)有《孙月峰评经》16卷,其中有《诗经》4卷、《书经》6卷、《礼记》6卷,非评其整体而论其篇章,此为“经”以篇章的形式进入总集。文体学家让“经”的文字放下身段,进入文体谱系。经、史、子的文字虽然也是以文体的身份进入文体谱系,但显示的是其文体功能,它们是经过改造才具备文体形式的。进而有了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为文体“归类”的总集。南北朝时颜之推提出文章“原出《五经》”,这是归类于“五经”的文体谱系,明黄佐《六艺流别》,把古代文体分别系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《易》六经之下,四库馆臣称“是书大旨以六艺之源皆出于经,因采摭汉、魏以下诗文,悉以六经统之”,“首次以选本建构文本六经的谱系”。明陈仁锡编《古文汇编》,四库馆臣称该书“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分部”。又有曾国藩《经史百家杂钞》之类的新型总集,即涵括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经、史、子三类的文字,约占全书1/4的分量,又把所录文章“归类”为著述、告语、记载三门,下分为11类文体,这是超越传统集部的总集,也是超越传统的文体谱系。又如以

人为单位的文章归类,如《古文观止》,等。

“归类”得益于剪裁与文章再造。萧统《文选序》称不录经、子、史等,其理由之一,就在技术操作上的所谓“岂可重以芟夷,加之剪裁”,深层次的则是这些文字非“篇章”“篇什”“篇翰”。方苞《古文约选序》就称史书中的“传”本不作为文体独立,称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之类,“各自成书,具有首尾,不可分割”,“虽有篇法可求”,“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取精焉”。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的做法,是从史的整体摘录“成文”或选摘部分文字,其所录入者是经过技术处理的,可谓文章再造,把“史”改造成为如“传”“叙”之类的“篇翰”再进入文体谱系;经、子的文字,也都经过类似的改造而成为“篇翰”“篇章”“篇什”,才能进入文体谱系。

如果单独的看经、史、子入集,会惊奇“集”的强大的吸纳能力;但如果放在整个古代学术史上来看,这只是“集”步经、史、子的后尘而已,经、史、子早就有着笼罩或融通其他学术的愿望与实践。“经”意谓常行的义理、准则、法制,指导一切、笼罩一切是理所当然的。“史”,司马迁就说过,其“成一家之言”就在于“厥协六经异传,整齐百家杂语”,就说统合经、子而成,王世贞则提出“天地间无非史而已”。“子”,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称“博明万事为子,适辨一理为论”,诸子之作的特点就是“论”,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称“论”在“陈政”、“释经”、“辨史”、“铨文”都可以用的,即“经、史、集”都有“论”。

“集”融通经、史、子而成文体谱系,或者说经、史、子入“集”、入文体谱系,是为了满足社会对“作文之式”的需求。“史”入总集,是因为宋时学习《左传》等古文以应课试成为时尚,如姚铉称《唐文粹》的编纂,“盖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用”;吕祖谦自序《左氏博议》“为诸生课试之作”;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称“以为作文之式”。

天下之“文”既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,但经、史、子、集又统一在文体谱系之中,这就是“贯通”。贯通,运用多种研究方法,打破学科藩篱、实现了学科融合;文体谱系的贯通,使天下所有书写文字都有文体,都进入文体谱系;贯通,使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各自吸纳对方而成一体;贯通使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还原为“文”,这是文体谱系贯通的最终方向。贯通,使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同源且同理,如此的文体谱系形成了新的稳定的研究范式,形成了持有如此共同研究范式的文学史家群体。西方的学科分类传入中国,建立起现今“文学”观念下的文学谱系,今天我们怎么认识、建立古代文体谱系?我们怎么认识、建立当代文体谱系?这是当今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,也是文体学家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
■ 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1期,约16000字